

未名中国史

2001-2007

下册

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编

W e i m i n g Z h o n g g u o s h i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未名中国史

2001—2007

下
册

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W e i m i n g Z h o n g g u o s h i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下 册

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	邓小南	(417)
关于“道理最大”		
——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	邓小南	(449)
“内外”之际与“秩序”格局:兼谈宋代士大夫对于《周易·家人》的阐发		
.....	邓小南	(466)
试谈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邓小南	(491)
宋代科举封弥誊录制度述论	张希清	(509)
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申论	张希清	(533)
杨业与云应襄朔四州	张希清 成一农	(548)
“以天下为己任”		
——范仲淹为政之道研究之一	张希清	(568)
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	刘浦江	(596)
再论阻卜与鞑靼	刘浦江	(618)
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	刘浦江	(638)
“五德终始”说之终结		
——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	刘浦江	(659)
宋代文献记载中的高丽社会		
——以《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为例	臧 健	(681)
宋代民间立嗣习俗与妇女生活		
——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主的分析	臧 健	(691)
收养:一个不可忽略的人口与社会问题		
——宋元民间收养习俗异同初探	臧 健	(707)

宋元至明清时期族规家法与两性关系	臧 健	(730)
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		
——兼论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布与影响	李孝聪	(757)
地图与档案	李孝聪	(776)
中国王朝后期中心城市的建设与区域差异的凸显	李孝聪	(786)
论所谓明铜活字印书于史初无征验		
——附论明代的金属活字印本	辛德勇	(817)

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1]

邓小南

宋代的士大夫政治,是长期以来被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与此相关的士人群体之特性,也经常在讨论之中。学界普遍注意到,北宋政治文化舞台上的士人,作为具有学养的文职官僚、作为社会和政治的精英,其身份属性、价值观念与能力素质都已经明显地不同于前代。^[2]这种“不同”的产生,经过了一个世纪以上的历程。本文希望聚焦于迄今研究尚嫌不足的10世纪前中期,讨论社会变迁过程中统治人群变化之一端,争取对其演进脉络有所梳理。^[3]

与上述议题相联系的,是论者经常提及的唐末至宋初之文武关系问题。^[4]应该看到,一方面,所谓“文”“武”,既相互排抑制约,又相互依存补充,在特定条件下相互参与着对方特质的塑造;在当时,既有双方关系的空前紧张,又有彼此接触之

[1] 如果我们着眼于历史运行的实际状况,而不仅仅是朝代的兴废,那么,应该说,自唐朝末年轻五代至北宋初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面临的社会矛盾性质类似,统治者在挣扎摸索中致力于解决的问题类似,这段期间事实上属于同一单元。本文所谓“群体”,是指社会上的某些类属,指具有某些认同感的人们的集合。群体中的成员,可能有出身背景、品级层次、个人经历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诸多不同,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并非紧密谐调,但就其整体而言,有着明显的共同特征。从这一意义上,本文将10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称为“群体”。这一群体,就其文职官员身份而言,可以笼统归之为“士大夫”;但就其整体资质而言,却并非兼具“官僚”与“学人”的特性。出于这一考虑,本文尽量回避“士大夫”这一概括方式。本文的讨论重点,不在于文官体制中的设官分职及权力行使等问题,也不在于士人道德观念的演变与思想的转型,而试图围绕文臣群体内各类人物之能力素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探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王小甫教授和北大历史系博士生李全德的大力帮助,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2] 参见包弼德(Peter 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第二章《士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唐宋史论丛(增订本)》,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绪论《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3] 加入并影响这一过程的因素很多。仅就文臣群体而言,10世纪前中期,在中国版图之内曾经先后存在多个政权,文臣状况亦互不相同。本文重点在于考察自唐末至宋初的文臣群体,而赵宋开国时期所继承的,主要是五代后周的官僚班底;故姑且不涉及北方的辽与南方诸国之情形。

[4] 所谓“文武关系”,不仅包括文臣武将群体之间的关系,还应该包括文武两类不同职业需求以及术业专长的关系。以往学界所讨论的,多在于前者;本文亦限制于文职官僚及其相关范围之内。

频密直接,有彼此之间更多的沟通机会。另一方面,在“文”“武”群体各自内部,也存在着家世背景、出身途径及个人资质等方面的重大差异,存在着摩擦与调适。不注意这些关系的丰富与复杂性,即有可能导致我们自己认识上的失误。

一、重“流品”与抑“浮薄”

唐末五代时期,与“武将”相对应的“文臣”,就其组合成分而言,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庞杂的群体。在他们之中,有的来自往日的名门、官宦世家,有的自身即前朝旧臣,有的则逢风云际会或凭借自己的能力起自民间。他们有的曾经从文业儒,有的素来不学无术;有的长于治事,有的不堪繁剧;有的洁身自好,有的则谄谀无行。他们中既有“儒生”、“文士”,亦有所谓“文吏”^{〔1〕}。

文臣群体的构成特点,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内部关系。以“华族科名”^{〔2〕}为特征的“衣冠之士”^{〔3〕},自唐末长期居于领袖群伦的朝廷重臣宰相之位;而五代的近臣谋士班底,则主要由一批沉浮于社会基层、在战乱及重建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善断繁剧、兼具刀笔吏干之才者组成。文臣群体中不同类型人物之间素存的芥蒂,在动荡之中显露无遗。只要看看李振者流对于“清流”的嫉恨,杨邠、王章等人对于礼乐文章的鄙薄,就不难明白,“文臣”们彼此之间的成见有多深。这些人虽然起家方式、素质能力各异,在当时却攀升向同类目标,在同一出路中搏争。这种艰难生涯中之挤抑排斥、升降成败造成的敌视是刻骨铭心的。横亘于他们之间的沟壑,实际上并不浅于文武之间的畛域区分。

〔1〕 本文所谓“文吏”,主要是指文臣中原吏职出身、特别是以吏能见长者,而不是指低级属吏序列中人。汪篋先生将吏治与文学之争视为唐代“玄宗朝政治史发微”的关键问题,见《汪篋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阎步克在其研究中,将学士、儒生与文吏的分化与融合关系,作为理解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的主要线索之一,见《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2〕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二《铁补阙贞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3〕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衣冠”通常是指文士、缙绅。该词的含义,像历史上许多词汇一样,寓有明显的时代印痕。张泽咸先生在其《唐朝阶级结构研究》一书中专门谈到,唐代后期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衰颓,“士族、衣冠的内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见该书第50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一)

10世纪前期,兼具“名族”与“文学”背景的所谓“衣冠之士”,在朝廷决策过程中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已经相当有限,但他们仍在竭力利用自身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试图维持其最后的地位。这种状况在唐末以及号称承继“大唐”的后唐时期反映得尤其突出。

唐朝末年的中央朝廷,从君主到官僚回天乏术,却出现了讲求士族流品的回潮。学界早有研究指出晚唐贡举为官宦士族、权豪子弟所充塞。^{〔1〕}咸通中举进士不第的胡曾,曾在其《下第》诗中抱怨道:“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2〕}昭宗朝进士黄滔也说:“咸通乾符之际,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3〕}风气所向,“当时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为之首”^{〔4〕},一时间之朝廷重臣多系出身于公卿之家或累代名族^{〔5〕}、且科举及第者。以昭宗后期的宰相为例:孔纬,曲阜孔氏之后,擢大中进士第;韦昭度,属京兆韦氏,咸通进士;崔昭纬,清河崔氏,亦进士及第;裴枢,出自“代袭冠冕”的河东著族闻喜裴氏,咸通进士^{〔6〕};崔远,博陵崔氏,龙纪进士,“诸崔自咸通后有名,历台阁藩镇者数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7〕};陆扈,祖系吴郡陆氏,光启进士,曾被皇帝寄予“斯文不坠”的期望^{〔8〕};柳璨,出自河东柳氏,光化登第,因学术博奥而“时誉日洽”^{〔9〕}……这批人的“衣冠声望”成为唐廷在无望中的希望。

〔1〕 参见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十一章第三节《晚唐微妙的形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

〔2〕 《全唐诗》卷六四七,中华书局,1999年。

〔3〕 《全唐文》卷八二五《蒲山灵岩寺碑铭》,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

〔4〕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八二《崔澹传》,中华书局,1975年。

〔5〕 这些“名族”,既有魏晋南北朝以来一直具有社会影响的旧有世族,也有隋唐以来形成的新士族。但究其实质,此时的“士族”,时代特征已与往昔大不相同。参见胡戟、张弓、李斌城、葛承雍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社会卷》第一章《社会阶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6〕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一三《裴枢传》,中华书局,1975年。

〔7〕 《新唐书》卷一八二《崔远传》。

〔8〕 《旧唐书》卷一七九《陆扈传》。

〔9〕 《旧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按河东为柳氏郡望,柳璨为柳公绰族孙,据两《唐书·柳公绰传》,公绰为京兆华原人。

唐代的历史走到这一步,所谓的“衣冠”“士族”,本已衍生出新的含义^[1];依郡望系等第的“名族”,早已与权力中心疏离而风光不再。既为大士族之后而复纷纷投身于科举,正反映出历史的发展趋势。^[2]而在经历了黄巢起义“天街踏尽公卿骨”式的扫荡之后,上层社会中反而出现了朝廷与“衣冠流品”的紧密结合。不过,此时会聚起来的这些兼具“阀阅”与“冠冕”者,实际上不可能再构成为封闭排他的贵族权势集团,除去可以增重些许身份作为号召之外别无意义。而且,“衣冠流品”对于政权的强烈依附,直接削弱了他们在乱世中的适应能力。^[3]这些人不幸在朝廷面对着内官中使乃至禁军将领的戒惕与抵制^[4],在外部面临着强藩咄咄逼人的压力,全无震慑扭转之功。如韦昭度者,“旧族名人,位非忝窃”,却被宦官田令孜讥讽为“在中书则开铺卖官,居翰林则借人把笔”^[5];至于裴枢等,更只被军阀朱温及其腹心视为“衣冠宿望难制者”^[6]。

正当王朝末路的这批士大夫,其资质构成有着令人瞩目的特点。唐廷为乞灵求助而寻觅得来的这批官僚,尽管兼备科举与门户背景,却多非学识才干兼长,惟其如此,他们对于“流品”有着特殊的维护与自矜。而这批人当危难之际的所作所为(或者说是“无所作无所为”),则暴露出他们的致命弱点。

(二)

唐哀帝天祐二年(905)三月,“朝廷宿望”裴枢、崔远、独孤损等人之相职被罢。事情的直接起因在于,操持重柄的朱温“欲以嬖吏张廷范为太常卿,唐宰相裴枢以

[1] 参见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十四章《科举与社会等级再编制》。旅美学人陆扬等亦曾指出,门第升降,不仅是社会现实变化的结果,也是观念变化的结果;观念的变化,最终使社会变化得以完成。进士科取代魏晋南北朝的士庶之隔,成为新的清浊区分标准;本属才能层面的“文学”,具有了官场评判层面的价值意义。

[2] 参见毛汉光:《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第339—363页。

[3] 参见毛汉光:《五代之政治延续与政权转移》,《中研院史语所集刊》五十一本二分;宋德熹:《唐代后半期门阀与官宦之关系》,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晚唐的社会与文化》,台北:学生书局,1990年。

[4]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六二,昭宗天复元年正月条,载宰相崔胤、陆扈欲乘诛除内臣“四贵”之机,罢中官典兵,而参与诛除有功的原神策军将无不反对,他们向皇帝表示,“臣等累世在军中,未闻书生为军主。若属南司,必多所变更,不若归之北司为便。”(中华书局,1956年)

[5] 《北梦琐言》卷六《田军容檄韦太尉》。

[6] 《旧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

谓太常卿唐常以清流为之,廷范乃梁客将,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语裴枢纯厚不陷浮薄,今亦为此邪!’”〔1〕

裴枢强调“将吏”与“清流”区别的做法,激起朱温的强烈不满。《旧唐书》卷二〇下《哀帝纪》,载有是年四月癸巳针对此事的一份诏书:

敕曰:“文武二柄,国家大纲;东西两班,官职同体。咸匡圣运,共列明廷;品秩相对于高卑,俸禄皆均于厚薄。不论前代,只考本朝:太宗皇帝以中外臣僚文武参用,或自军卫而居台省,亦由衣冠而秉节旄,足明于文列武班,不令分清浊优劣。近代浮薄相尚,凌蔑旧章,假偃武以修文,竞弃本而逐末。虽蓝衫鱼筒,当一见而便许升堂;纵拖紫腰金,若非类而无令接席。以是显扬荣辱,分别重轻,遽失人心,尽隳朝体。致其今日,实此之由。须议改更,渐期通济。文武百官,自一品以下,逐月所給料钱,并须均匀,数目多少,一般支給。兼差使诸道,亦依轮次,既就公平,必期开泰。凡百臣僚,宜体朕怀。”

诏书之后又有这样一段说明:

和王傅张廷范者,全忠将吏也,以善音律,求为太常卿,全忠荐用之。宰相裴枢以廷范非乐卿之才,全忠怒,罢枢相位。柳璨希旨,又降此诏斥枢辈,故有白马之祸。

这段说明有其不确切处。裴枢对于张廷范的抵制,主要不在于其“非乐卿之才”,而在于他不属“清流”。同为《旧唐书》,《裴枢传》中所载朱温“切齿含怒”的一番话,也是指责裴枢说:“吾常以裴十四器识真纯,不入浮薄之伍,观此议论,本态露矣。”

这篇指斥“浮薄”的诏书,出自亦属“衣冠流品”的宰相柳璨之手。〔2〕柳璨任相后,为同列之裴枢、独孤损、崔远等“宿素名德”所轻,因而“深蓄怨”。〔3〕该诏书可以说是对于士大夫“清流”势力的一次清算。它将唐王朝当时面临的严重危机归因于长期以来对于文武清浊的区分。这种说法,在点破了一个重要事实——“朝廷宿望”集体性的被清算,背后存在着自关陇集团破坏以来文武矛盾酿就的严

〔1〕《新五代史》卷三五《唐六臣传》。

〔2〕按柳璨虽出自河东柳氏,而自幼孤贫,宗人之贵显者,“不以诸宗齿之”(《旧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这种背景或许使其对于“衣冠清流”素有积怨。

〔3〕《旧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

重问题^[1]——之同时,也刻意掩饰着另外一些事实:例如朱温清除异议障碍的篡国企图;例如此次对于衣冠之士的翦除,事实上与文人之间的种种积怨有关。

是年五月,出现星变。柳璨“首疏素所不快者三十余人”^[2],且言于朱温曰:“此曹皆聚徒横议,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灾异”^[3];被朱温称作“张夫子”、倚为“谋府”的张策,因当年出家归俗、数就贡籍而被知举官赵崇所抑,亦“极力媒蘖”^[4];曾经屡举不第的朱温谋士李振也建议说:“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纲纪;且王欲图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难制者也,不若尽去之。”^[5]于是,不但裴枢、独孤损、崔远三人与陆扈、王溥等相继外贬,“自馀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缙绅为之一空。”^[6]六月戊子,遂有白马之祸:

左仆射裴枢、独孤损,右仆射崔远,守太保致仕赵崇,兵部侍郎王赞,工部尚书王溥,吏部尚书陆扈皆以无罪贬,同日赐死于白马驿。凡搢绅之士与唐而不与梁者,皆诬以朋党,坐贬死者数百人,而朝廷为之空。^[7]

“白马驿事件”的建议人与决策者之泄愤、打击的对象虽非完全一致^[8],但事件的直接目标,显然是针对“衣冠清流”的。事件中罹难的主要人物,都是昭宗时期的唐廷重臣。尽管“唐自昭宗迁都之后,王室微弱,朝廷班行备员而已”^[9],但直至白马驿事件,才算是残忍而明确地宣判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1] 陈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关陇集团本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故文武不殊途,而将帅可兼任”,而自该集团衰腐破坏之后,至玄宗朝,“将相文武蕃汉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见该书第48—49页,三联书店,1956年。

[2] 《旧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

[3] 《资治通鉴》卷二六五,昭宗天祐二年五月乙丑条。

[4]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反初不第》,中华书局,1959年。又,《北梦琐言》卷三《赵大夫号无字碑(张策附)》条亦载,“清河公乃东依梁主而求际会,盖为天水拒弃,竟为梁相也”。

[5] 《资治通鉴》卷二六五,昭宗天祐二年五月乙丑条。

[6] 《资治通鉴》卷二六五,昭宗天祐二年五月庚辰条。

[7] 《新五代史》卷三五《唐六臣传》。

[8] 例如,柳璨、张策针对有宿憾的“朝士大夫”,李振针对科场仕途得意之“清流”,而朱温则既忿忿于流品问题,更欲为新政权扫除潜在的障碍。

[9] 《旧五代史》卷一八《李振传》。

(三)

“白马之祸”之所以在时人心目中以及后世议论中留下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不仅在于杀戮本身的惨酷，更在于继之以将“衣冠清流”之尸投入黄河之浊流。正是这一“清”一“浊”，彰显出这件事的深层次意义所在。《旧五代史》卷一八《李振传》中说：

天祐中，宰相柳璨希太祖（按指朱温）旨，谮杀大臣裴枢、陆扆等七人于滑州白马驿。时振自以咸通、乾符中尝应进士举，累上不第，尤愤愤，乃谓太祖曰：“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太祖笑而从之。

在事变面前，李振等人不仅全无物伤其类的悲哀，甚且落井下石。一些“书生”成为整肃“清流”事件的直接推动者^{〔1〕}；而一向鄙薄敌视“清流”的朱温，实际上也是“家世为儒”的书生后代^{〔2〕}。这使我们注意到当时“流品”“清浊”问题影响之广及其严重程度。

这场“清流”之祸，显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柳、李、张等个别人物。^{〔3〕}白马驿事件的导因，从字面上看，起自当时的权势者对于“浮薄”风气的憎恨。除指责裴枢等人“浮薄”之外，朱温也曾斥骂赵崇为“轻薄团头”。^{〔4〕}在唐代，“浮薄”一词的高频率出现，是在词科取士兴盛之后。彼时所谓“浮薄”，多是相对于经术笃厚学风而言，指词科进身者艺业的华而不实^{〔5〕}，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礼法旧门”对于

〔1〕李振“深疾缙绅之士”的举措被视为“鸱枭”之行（《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天祐二年六月戊子条）；而柳璨亦因其助纣为虐而被称为“隳其家声，所谓‘九世卿族一举而灭之’”（《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天祐元年正月丙午条下胡注）。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其书生身份及家世背景而言的。

〔2〕《北梦琐言》卷一七《梁祖为佣兵》条称其“家世为儒，祖信、父诚，皆以教授为业”；朱温本人，亦曾称其父为“朱五经”，见《新五代史》卷一三《梁家人传一·文惠皇后王氏》。

〔3〕唐末至五代初期，不得志文人利用机会挟怨报复的事例很多。例如李山甫，“咸通中不第，后流落河朔，为（魏博节度）乐彦祯从事，多怨朝廷之执政，尝有诗云：‘劝君不用夸头角，梦里输赢总未真。’”伺机决一胜负的企冀跃然纸上。中和四年（884）十二月，前宰相王铎被害于魏博，导因之一即李山甫“以咸通中数举不第，尤私愤于中朝贵达，因劝（彦祯子）从训图之”。参见《南部新书》丁、《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北梦琐言》卷一三《草贼号令公》。

〔4〕《南部新书》甲。

〔5〕参见《旧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卷一一九《杨绾传》、卷一三五《韦渠牟传》、卷一六八《钱徽传》。

“词科新贵”的轻蔑^{〔1〕}；而唐末裴枢、赵崇等人所抑制的，是急于晋身的“浮薄”；至于朱温、李振等人以及天祐诏书中的“浮薄”之说，尽管利用了这一习见词语，却将其与“衣冠”“清流”直接联系在一起^{〔2〕}，流露出社会上的新起势力对于名流士大夫发自内心的不信任甚至仇视。词义的变迁背后，事实上寓含着深刻的社会变迁之轨迹。^{〔3〕}

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

唐末黄巢失败后，朱全忠遂执统治之大权。凡藉进士词科仕进之士大夫，不论其为旧族或新门，俱目为清流，而使同罹白马之祸，斯又中古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4〕}

白马驿事件的意义，与其说是使唐室重臣受到斩尽杀绝式的打击，不如说是一次时代鼎革的警示。正是这种“梁有禅代之谋”，而“衣冠自相残害”的状况，迫使当时的许多士人避世不出。^{〔5〕} 欧阳修在所作《唐六臣传》中开篇即慨叹道：“甚哉，白马之祸；悲夫，可为流涕者矣！”一个是“笑而从之”，一个是“可为流涕”，如此鲜明强烈的感情色彩对比，背后透露出来的，是煌煌大唐穷途末路之时士大夫们的无奈。

二、“崇尚”与“荡涤”

(一)

即便在唐末五代最为混乱的政治局面之下，担当着各个层次统治权力的职业军将们，事实上都不能无视诸雄对峙的压力以及政权运作的需求，都不曾全然排拒

〔1〕 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92页。

〔2〕 唐末五代时期取类似说法者不为罕见。朱温称帝后，疑唐进士崔禹昌有讥讽意，以“轻薄”怒斥之（《北梦琐言》卷四《崔禹昌不识牛》）；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二六二《郡牧》条引王仁裕《玉堂闲话》，批评行止无当之“青梁子出刺者”曰：“士流中亦有故为轻薄者。”（中华书局，1994年）《北梦琐言》卷三《河中钱刘相瞻》条也说到河中“幕寮有贵族浮薄者”云云。

〔3〕 至北宋时，对于“浮薄”的批评，则多与游惰、虚誉、锐进喜事等作风相联系。可参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端拱二年正月乙未王禹偁奏疏；卷四四，咸平二年二月己酉真宗诏；卷五六，景德元年七月丙戌李沆进言等。

〔4〕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92页。

〔5〕 《旧五代史》卷六七《李愚传》。

文人们作为治事参谋、行政助手的作用。而不同背景、不同资质的文人,各居其位,充当着不同的政治角色。

开平元年(907)五月,后梁建立之初,朱温组建的执政班子是:以唐朝旧臣张文蔚、杨涉、薛贻矩为宰相^[1],而由“预帷幄之谋”的近臣敬翔担任掌领机要的崇政院使。易代之际的这批宰相,张文蔚父张弼“朝望既高,号为流品”^[2],他本人“以文行知名”,“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杨涉出“唐名家,世守礼法”;薛贻矩“名家子,擢进士第”^[3]。其后任相的张策、赵光逢、杜晓,都是“衣冠子弟”,两三辈唐室重臣^[4]。这些人无疑仍然属于“清流”之绪余,他们对于制度的熟悉以及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有利于新朝统治的稳定。但是,这批人物,其活动形象树立于前朝,在时人心目中难遽割断他们与前朝的关联,创业君主对他们也并不放心:

时全忠恐唐室旧臣不利于己,往往阴访群情,疑贰之间,及祸者甚众。^[5]

这使他们可能是某种连贯性的象征,却不会是新朝的决策核心。而值得一提的是,一方面当时的唐室旧臣人人自危,另一方面这些宰相在位却相当稳定。^[6]正是由于王朝的实际决策权牢牢把握在梁太祖及其亲信谋臣手中,而中书门下职任则无关紧要(或者说一定程度上“虚仪化”),终致保全了这些居位的宰相。

与李振同样在唐末“举进士不中”的敬翔,“尤长刀笔,应用敏捷”,归附朱温后,“扈从征伐,出入帷幄,庶务丛委,恒达旦不寝”^[7],他典掌机要,前后跟随梁太祖三十年,宠任不替,“军谋、民政,帝一以委之”^[8]。胡三省称“全忠之移唐祚,敬翔之力也”^[9]。被梁太祖誉为“叶赞之功,惟裴公有之,他人不足当也”^[10]的裴迪,“敏事慎言,达吏治,明筹算”,

帝初建节旄于夷门,迪一谒见如故知,乃辟为从事。自是之后,历三十年,

[1] 任韩建为相的日期,两《五代史》记载不同。旧史在是年五月,新史在六月。

[2] 《北梦琐言》卷八《三朝士以名取戏》。

[3] 《北梦琐言》卷一六《薛贻矩画赞》。

[4] 《旧五代史》卷一八《张策传》,《新五代史》卷三五《唐六臣传》。

[5] 张世南:《游宦记闻》卷十引杨凝式传,中华书局,1981年。

[6] 张文蔚卒于相位,杨涉、杜晓在位三年,薛贻矩、赵光逢、于兢任相仅六年。

[7] 《旧五代史》卷一八《敬翔传》。

[8] 《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开平元年四月辛未条。

[9] 《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光启三年十一月。

[10] 《新五代史》卷四三《裴迪传》。

委四镇租赋、兵籍、帑廩、官吏、狱讼、赏罚、经费、运漕,事无巨细,皆得专之。帝每出师,即知军州事,逮于二纪,不出梁之闾閻,甚有裨赞之道。^{〔1〕}

我们看到后梁上层文臣集团中的不同类别:一类来自前朝旧臣,所谓“楚国群材,终为晋用”^{〔2〕},他们的功用虽不仅仅在于为新朝装点门面,但隐约之间的“旧臣”身份使其经常处于尴尬地位之中;另外一类来自新皇帝的旧部僚属,与帝王关系更为亲近密切。前类人多为所谓文士,他们习熟于朝章,参与议定制度礼仪却几乎不预机要;后一类人则多是起于基层、“事无巨细,皆得专之”的文吏型实权人物。这种区分,在维持了三百年的大唐帝国一朝顿殒、唐梁递嬗之际反映得尤为明显。

(二)

“白马之祸”宣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但那一时代所崇尚的价值观念并未随之而彻底销声匿迹。^{〔3〕}

后唐政权以赓续“大唐”为号召,尤其重视“求访本朝衣冠”^{〔4〕}。同光元年(923)二月,李存勖下令“于四镇判官中选前朝士族,欲以为相”^{〔5〕}。唐末兼重家世背景与本人进士第的做法再度泛起。这种现象,在庄宗朝十分突出。当时先后任用的四位宰相豆卢革、卢程、赵光胤、韦说,都主要是凭借家世背景登上相位的。这些人偏爱标榜“名家”“名流”身份,却缺乏实际才能;硬撑起的门面,掩不住“名族之后”没落衰败的景况。

《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中说:

豆卢为世名族,唐末天下乱,革避地之中山,唐亡,为王处直掌书记。庄宗在魏,议建唐国,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乱丧亡且尽,以革名家子,召为行台左丞相。庄宗即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革虽唐名族,而素不学问,除拜官吏,多

〔1〕《旧五代史》卷四《太祖纪四》,开平二年四月甲寅条。

〔2〕《旧五代史》卷三《太祖纪三》,开平元年正月戊辰梁太祖即位制书。

〔3〕如宁志新、朱绍华《门阀士族的衰落与衰亡原因》一文所指出:“门阀士族在文化与礼俗这两个方面优势的丧失,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绝不会靠一两次农民起义的打击就能达到的,也不会因朱梁代唐时的屠戮行为所能实现的。”见《河北学刊》2002年第5期,第130页。

〔4〕《旧五代史》卷六〇《苏循传》。

〔5〕《资治通鉴》卷二七二。

失其序。

卢程是这类“名家子”中的一个典型。据《旧五代史》卷六七《卢程传》：

卢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蕴，历仕通显。程，天复末登进士第。……程与革、（卢汝）弼皆朝族知旧，故往来依革，……程褊浅无他才，惟矜恃门第，口多是非，笃厚君子尤薄之。

卢程兼具“右族”与“进士”背景，却“褊浅无他才，惟矜恃门第”，他自称“叨忝成名，不闲笔砚”〔1〕，章奏文翰非其所长。胡柳之役后，时为晋王的李存勖选取巡官冯道为掌书记，而以卢程为支使。据《新五代史》卷二八《卢程传》说：

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门阀而先田舍儿邪！”〔2〕

同样这句话，在《旧五代史》卷六七《卢程传》中记作：“主上不重人物，使田里儿居余上。”两相印证，正从一个侧面表明，在卢程等人的眼中，所谓“人物”，是据其“门阀”来判断的。

庄宗看重“豆卢革与程皆故唐时名族”〔3〕，故即位伊始便并命为宰相。二人之不识时务，于受命之日即暴露出来：

程本非重器，骤历显位，举止不恒。时朝廷草创，庶物未备，班列萧然，寺署多缺。程、革受命之日，即乘肩舆，骑导喧沸。庄宗闻诃导之声，询于左右，曰：“宰相担子入门。”庄宗骇异，登楼视之，笑曰：“所谓似是而非者也。”〔4〕

庄宗灭梁后任命的宰相赵光胤，其父赵隐为僖宗咸通时宰相，兄光逢仕梁为相；他本人“以词艺知名，亦登进士第”，但他被置于重位，则是因为“议者以为国朝典礼故实，须访前代名家”〔5〕。由豆卢革推荐的另一宰相韦说，是唐福建观察使韦岫之子，“亦无学术，徒以流品自高”。“时郭崇韬秉政，说等承顺而已，政事得失，无所措言。”〔6〕由此也可以得知，当时的朝廷主要是以“衣冠”“名流”缘饰政治，而并非

〔1〕《旧五代史》卷六七《卢程传》。

〔2〕《新五代史》卷二八《卢程传》。

〔3〕同上。

〔4〕《旧五代史》卷六七《卢程传》。

〔5〕《旧唐书》卷一七八《赵隐传》，《旧五代史》卷五八《赵光胤传》。

〔6〕《旧五代史》卷六七《韦说传》。

真正依靠他们。

被李存勖呼为“七哥”且佐其“中兴之业”的张承业(唐僖宗时宦者,本姓康,当出于粟特),“尤不悦本朝(按指唐朝)宰辅子孙”^[1],对于“名门之后”的实际治事能力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即便是庄宗本人,忿于卢程之自傲而无能,亦曾有“误相此痴物”^[2]之悔。

后唐明宗时的宰相组合,逐渐自“名家”“流品”向个人能力方面倾斜。

明宗登基之初,机要决策仍倚重于藩邸侍臣,对于宰相的选择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豆卢革、韦说相位一度保留,同时任郑珣、任圜为相。郑珣是唐代宰相郑良的侄孙,后梁时曾任宰相。史称其前后两度“在相位既碌碌无所为,又病聋”^[3]。天成二年(927)罢豆卢革、韦说,明宗考虑提拔韦肃作宰相,他所引述的原因之一,即“世言肃名家子”^[4]。此番任命的崔协,出自唐代“盛为流品”的清河崔氏小房。清河崔氏“自后魏、隋、唐,与卢、郑皆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礼。至其后世子孙,专以门望为高,为世所嫉”。^[5]崔协本人虽然“器宇宏爽”,却“高谈虚论,多不近理,时人以为虚有其表”;“登庸之后,庙堂代笔,假手于人”^[6],”在位无所发明”^[7]。这批人物能够居于相位,事实上与宰相群体在当时的微妙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

长兴初,情况有所变化。明宗拟罢枢密使安重海,派使至中书,趣宰相冯道等议其代;反映出中书门下在朝廷谋议过程中地位的上升。而在“后安重海时代”,与宰相参与决策机会的增加相应,入选者的家世背景逐渐淡化而个人因素相对受到重视。明宗朝八年间先后任用宰相十人,除豆卢革、韦说(庄宗朝宰相留用者)、郑珣、崔协称得上是“名门之后”,任圜、冯道、王建立^[8]、赵凤、李愚^[9]、刘昫等其

[1] 《旧五代史》卷六〇《李敬义传》。

[2] 《旧五代史》卷六七《卢程传》。

[3] 《新五代史》卷五四《郑珣传》。

[4] 《新五代史》卷二八《任圜传》。

[5] 《新五代史》卷五五《崔居俭传》。

[6] 《旧五代史》卷五八《崔协传》。

[7] 《新五代史》卷五五《马胤孙传》。

[8] “少历军校”而“目不知书”的王建立,天成三年三月自镇州节度使被任命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判三司,是五代时期少数由武职而任宰相者之一。同年十一月罢,在相位八月。参见《旧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纪第五》,《旧五代史》卷九一《王建立传》,《资治通鉴》卷二七六,天成三年八月甲戌、十一月甲午条。

[9] 《旧五代史》卷六七《李愚传》中,说他“自称赵郡平棘西祖之后”。

他六人没有特殊的名族高门背景。豆卢革、韦说在任不足三月,郑珣、崔协亦不过两年。长兴中,“与明宗有旧”的唐朝宗属李麟,自称“家代重侯累相”,游说时相“唐代中兴,宜敦叙宗室”,本人“常贮人相之意”,却终于未在朝廷考虑之中。^{〔1〕}在长兴以后的政坛上,很少再见到以“高门”自恃、靠“名家之后”的身份攀升成功之人。^{〔2〕}这背后发生着两个参差交错的过程:一是中书门下掌管的行政权力逐渐有所增重,一是“名门之后”面临社会激剧变迁的不适应,日益凸显出来。

(三)

能力素质的欠缺,是导致“右族”衰败的根本原因之一。所谓“名家子”们,矜于门望却一无所长,张承业曾经质问卢程:“公所能者何也?”^{〔3〕}这事实上已经是无法回避的严重问题(详见下文)。在长期动荡之中,“名族”往昔借以发展延续的政治经济根基严重动摇,而且既不讲求“礼法门风”,又丢弃了赖以炫世的家学传承,全不具备原本意义上的士族所看重的文化传统。“素不学问”、俯仰于时成为他们共同的特征。他们的征引门户、骄矜作态,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这决非名族势力在此时转而强盛的反映,恰恰相反,是由于他们感受到处处被炙手可热之新起势力逼迫的切肤之痛,无助之下而彼此牵引故旧,“徒以流品自高”^{〔4〕}。

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自己熟悉且仅有的这一切,试图去影响、去“规范”身边新起的权势人物。豆卢革等人对于当时执掌大权的郭崇韬之诱导,就是明显的一例。《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

……及权倾四海,车骑盈门,士人谄奉,渐别流品。同列豆卢革谓崇韬曰:“汾阳王代北人,徙家华阴,侍中世在雁门,得非祖德欤?”崇韬应曰:“经乱失谱牒,先人常云去汾阳王四世。”革曰:“故祖德也。”因是旌别流品,援引薄徒(按:这里对于郭崇韬的批评,仍然是将“流品”问题与“薄徒[浮薄之徒]”联

〔1〕《旧五代史》卷一〇八《李麟传》。

〔2〕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此时官僚制度与朝廷要员素质的调整已经完成,更并不意味着政治的清明。特别是明宗晚年多病,王淑妃“专内以干政,宦者孟汉琼因以用事”,加剧了朝政的紊乱,见《新五代史》卷一五《唐明宗家人传》、卷三八《宦者传》。

〔3〕《旧五代史》卷六七《卢程传》。

〔4〕《旧五代史》卷六七、《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